

# 把握机遇 应对危机 强化合作

## ——“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综述

黄耀东

**[摘要]** 2009年10月17~18日在中国南宁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吸引了来自中国、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中国—东盟国家,美国、韩国等其他国家较有影响的专家和学者,广西政府的高官和驻邕中央媒体,广西区和南宁市的媒体记者100多人前来参加。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各位发言嘉宾分别对金融危机下的各国应对方式、即将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等问题畅所欲言,见解精辟,会议成果令人满意。文章将用有限的篇幅浓缩而全面地介绍本次会议的情况。

**[关键词]** 中国—东盟智库战略;金融危机;应对方式;媒体

**[作者简介]** 黄耀东,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9级博士生,广西 南宁 530022

**[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9)11-0141-05

2009年10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共同主办,广西社会科学院具体承办的以“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在美丽的绿城—南宁举行。会议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古小松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黄道伟、广西区人大副主任刘新文、广西区政协副主席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科高·索萨亚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国家的100多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并部分发言,新华社、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等中央驻邕、广西区及南宁市各重要媒体出席会议并作了相关报道。

### 一、并肩携手 共克时艰

本次论坛不但请来了广西区领导,也引来了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中国—东盟的智库高层。在别开生面的开幕

式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黄道伟等领导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黄道伟作了题为《共同推动区域合作,携手共克时艰》的发言。黄道伟说,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遭遇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目前,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渐触底,但是世界经济衰退的基本态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实体经济恶化超出预期,全球经济复苏可能经历较长和曲折的过程。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加强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目前,东亚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增加亚洲区域内部贸易。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以东盟加中、日、韩三国(即10+3)的合作机制。十多年来,东亚地区以东盟为中心,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最突出的是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深入双边贸易的同时,为预防下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强了区域范围的货币和金融合作,“清迈倡议”在金融危机下得到扩大。中国是亚洲合作的积极

参与者与建设者,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近些年来,中国与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多边或双边自贸协定,拥有 19 亿人口、GDP 近 6 万亿美元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 2010 年全面建成,推进了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广西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从 2004 年以来,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每年在南宁举办,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纳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广西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正在向建设为国际区域合作新高地和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大步迈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关于金融危机下产业转型的发言令人深思。张蕴岭说,金融危机向我们警示,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比较 1997 年的经济危机,当时经济恢复是依靠外部的拉动,各个国家通过促进出口、限制进口、增大储备使经济逐步恢复活力,但这一次不同,外部市场拉动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这个发动机转不起来,今后可能是慢速度转动,就是说我们会面临严重调整的任务。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尽管保持较高增长,但是这一个月份我们中国出口是以双位数的速度继续下降。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内需拉动,所以出口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张蕴岭还提及东亚合作发展思路和中国发展与区域战略等问题。他说,中国经济顶住了这一次危机冲击,依靠内需维持较高增长,这个势头会继续下去。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政策对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也面临严重的转型挑战。从地区合作来说,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参与地区合作,对东亚合作非常重视。多重框架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深入合作的东亚合作也符合中国利益,因此即使有难度我们也要实践,也要努力。中国—东盟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变为合力,进一步推动东亚合作和发展。

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吕余生在会上作了发言。吕余生说,“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是中国与东盟双方专家学者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贡献智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共同探索中国与东盟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发展的方向,坦率地讨论双方合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增强互信、共同发展献计献策,为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作出

我们专家学者应有的贡献。广西社会科学院作为广西的智库之一,近年来,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等方面快速发展壮大,科研力量不断增强,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广西社会科学院也很重视与东南亚国家智库的学术交流。通过双方交流,加深了互相了解和友谊,扩大了视野,提高了学术水平。在去年的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我们搭建了交流的平台;今年的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我们将继续往开来,携手并进,共同将论坛推向更高的层次。实践将证明,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将成为中国与东盟的专家学者战略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广西社会科学院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论坛的举办。

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科高·索萨亚代表老挝社会科学院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这个重要的国际性论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岁生日后不久召开的,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老挝第一次有幸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活动,论坛将有利于我们共同探讨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全球环境下推动东南亚和中国向前发展。作为东盟成员国,老挝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合作伙伴,有着很强的区域战略和远大的区域意识。由于采取了全球性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也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众所周知,老挝社会科学院成立于 2006 年 7 月,是刚刚学步的儿童。因此我们参加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各位学习发展经验,而不是与大家分享经验。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在致辞中说,在互信与有利的决策环境下,中国—东盟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了。尤素夫·瓦南迪说,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对东盟国家善意的举措,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签订合作条约,在亚太和东亚地区积极和负责任地参与区域合作组织(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以及有目的地实行南中国海洋法,在安全领域采取信任措施,中国赢得了信任。除了这些,中国还积极与各东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进行多领域的合作。这些举动表明中国善意和友好的愿望。

## 二、调整经济战略应对金融危机

本论坛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应对金融危机:经济调整与新战略”。议题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高级研究员牛铁航和柬埔寨国王顾问、柬埔寨和平与合作学院院长诺罗敦·西里武主持,主要就金融危机下如何进行经济调整、采取新战略的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在会上作了《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经济调整和新战略》的发言。张晓晶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应对措施和经济恢复与适度增长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晓晶说,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发异彩。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积聚力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58%的出口产品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的恢复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反弹。中国的股票不可能不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没有脱钩之说,因为美国的价格也会波动性外溢到中国。2007年底,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之前,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经济调整,焦点就集中在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市场作用是中国恢复经济的关键,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城市化,因此要提升现代服务业,促进消费。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武志诚分析了2008~2009年越南经济发展状况。他说,多年来,越南政策主要关注基于投资和信贷膨胀的经济增长。2007年越南成为WTO成员国,这使越南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也刺激了越南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由于能源和大米价格上涨,加上在证券和房地产方面采取了不当的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动荡下高通货膨胀的产生,2008年越南出台了应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系列政策。从2008年第4季度起,越南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因而政府应将政策转向刺激经济活动与确保社会保障方面。武志诚认为,越南的传统发展模式侧重于经济增长、基本制度和资源配置政策,由此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市场体制以及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但这些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过去的23年中,越南的发展模式包括了国家、市场与一体化的结合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政策的结合。越南仍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作了《以区域合作应对东亚金融风险》的发言。高海红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东亚国家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和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前者是典型的源

自东亚、区域性的、局部的资本项目危机,本次危机则是全球范围的由金融部门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尽管这一次东亚并非危机的发源地,东亚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也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在危机来临之时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却暴露无遗。一方面,由于东亚国家出口严重依赖区外市场,美欧国家的经济衰退对东亚实体经济的影响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东亚资本主要在区外循环,金融危机带来全球风险重估,造成东亚资本流动的高度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更严重的是,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功能基本丧失。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理解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如何审视现有区域金融合作的缺欠,如何为保证东亚区域金融稳定确立区域金融合作的方向,如何为实现目标制定可行的实施步骤,这些都成为东亚国家决策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 三、加强区域联系 促进东亚合作

论坛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新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办公室主任王立强主持了议题的发言和讨论。

浙江树人大学外经贸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陆建人博士作了《东亚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的发言。陆建人首先对东亚最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了简单回顾。他说,东亚(10+3)合作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至今已有12年历史。1999年东亚13国领导人就推动区域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首次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此后,10+3机制逐渐完善,从非正式到正式化,从经济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至今,已在18个领域建立了约50个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陆建人总结了10+3合作的主要成果,同时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道:东亚合作已开展十多年,当年的期望是建立10+3自由贸易区,现在来看,并不现实。东亚合作将依照过去10年的方式,深化和扩大领域合作,而非实现一体化。没有一体化组织,不会对东亚经济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东亚生产网络正在发挥一体化的替代功能。东亚经济体将继续与区外,尤其是亚太贸易伙伴签署双边FTA,以此弥补本地区非一体化的损失。这将加快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也许将借助亚太一体化最终实现自身的

一体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思成作了《增强区域联系,完善区域主义》的主题发言,分析了东亚的形成、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论及次区域合作时,陈思成提出了四个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一是在跨国和非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各国因为一致的安全利益而表现积极。二是尽管出现一些主权和干扰问题,区域内控制和监督力度不足,但东亚国家仍然能紧密和卓有成效合作应对卫生问题和自然灾害的挑战。三是在打击跨国犯罪,尤其是贩卖毒品和人口方面,中国和东盟 10国加大合作力度,多方面打击,成效显著。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机制的建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四是东亚各国经过努力渐渐缓解了朝核问题、东亚地区核扩散问题等,东南亚后起开发商贪婪的能源需求也得到了有效抑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沈世顺作了《中日韩峰会催生“东亚共同体”》的发言。值得注意的是,沈世顺认为东亚要建立东亚合作机制还有几个需要正确对待的问题:一是成员国构成和地区外国家加入的问题。二是主导权问题。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在东盟,但有人把这比喻为“小马拉大车”,认为本地区的大国和强国应该起主导作用。日本担心中日将争夺主导权。作者却主张集体领导和分享主导权,因为东亚合作进程是单个国家不可能左右的。三是以什么为精神支柱问题。有的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有的以相同价值观为基础,有的以“东方文明”或“亚洲价值观”为基础,有的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作者主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因为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远远超出了彼此间的差异和对立。此外,还有各种差异的交织和热点问题的处理等等。作者认为建设“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一件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在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心同德,以东亚国家的聪明才智,建设更加美好的东亚。

#### 四、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合作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利萨尔·苏格玛主持了第三议程的发言。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菲律宾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马嫫,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分别作了发言。

尤素夫·瓦南迪作了《中国与东盟:加强未来关系》的发言。瓦南迪说,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有着牢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基于双方取得的互信以及有利的战略环境。由于中国对东盟采取的多项积极行动,双方取得了互信。例如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积极负责地参与亚太—东亚地区的区域机制、尝试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成员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的良好愿望与友谊之情。有利战略环境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支持全球与区域规则与制度的主要力量,而不是要统治世界的革命力量。事实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建立多边关系。另外一个有利战略环境的因素是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促成了基于多边主义的区域环境。如果双边联盟依然存在,那么未来它们将会因为多边制度和规则而取得平衡。因此在过去 25年里,东亚与亚太地区相对和平,使该地区国家可以迅速发展经济。谈到中国与印尼关系,尤素夫·瓦南迪说,双方必须增强相互了解。尤其是印尼,与中国已经 2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了,它失去了很多中国通,同时由于对汉语的掌握水平低,印尼无法密切或直接跟上中国的发展,造成双方误解加深。将来我们应该加大努力相互了解,克服这些局限。互派学生对双方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应该定期进行学者、知识分子、或智库交流,每年互派大量青年人到对方国家学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马嫫作了《推进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力》的发言。马嫫说,中国是毗邻东南亚的最大国家,也是陆地共同边界线最长和海域相交面最大的国家。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率先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在经济上更大程度地融入东盟,形成了共赢局面。2010年 1月 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如期建成,这是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大标志,同时也要求双方的关系有更新和更高的发展,这就需要新的动力来推进。马嫫认为未来的新动力包括三个方面,即现有基础、地区治理和和谐地区。过去,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看来还不够。因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

系在一起。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仅对世界,而且对中国来说都意义重大。在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一部分的大背景下,中国不能只从自己发展的要求来营造周边环境,而要从对周边的影响来设计和规划自己的发展,“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作了《越中关系与“两廊一圈”的构建》的发言。杜进森说,越中两国互为近邻,两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特色相似。自从1991年越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政治关系一直迅速发展。然而,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并未跟上政治关系发展的步伐,两国并未有效地发掘各自的潜力。因此,构建“两廊一圈”不仅就任何一方而言意义重大,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 五、次区域合作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韩锋主持了第四议题的发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南国际研究学院助教李明江作了本议题有关“次区域合作的作用”的发言,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古小松,泰国政法大学教授陈伟文,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建文分别就“泛北部湾合作”主题作了发言。

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古小松作了《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开拓与运作》的主题发言。古小松说,途经中国东盟七国的南宁—新加坡大通道过去鲜为人知,其实它是现成的。在日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只要沿途各方稍加开拓和利用,它就将大大造福各方。合作可以从简易的运输和旅游开始。古小松首先谈及“南新经济走廊的提出和意义”。他说,2004年初本人提出了建立“南宁—曼谷经济走廊”的构想。目标是通过南宁—曼谷经济走廊的开发建设,直接推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并直接辐射到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家。在2006年7月20日南宁举办的北部湾合作论坛上,广西区党委书记刘奇葆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合作战略,其中“一轴”——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以下称南新经济走廊)北南纵贯中国华南到中南半岛,途径国家多,交通载体有基础,可操作性强,很值得研究和大力推进。谈到南新经济走廊开

发建设的战略意义时,古小松说,南新走廊可视为中国东盟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之一。走廊的开发将会极大改善该区域的交通运输条件,将会盘活该区域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优化该区域各种资源的配置,进而促进经济走廊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古小松认为南新经济走廊是现成的,一是因为南新经济走廊经过中国和东盟6国。目前该走廊的铁路和公路网络已有一定基础,而且走廊两端的南宁和新加坡,又分别是区域的交通中心,该走廊必将成为联结中国与中南半岛最为便捷、综合效益最好的干线通道。二是因为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不平衡,但都有上升态势。三是因为南新经济走廊不仅是一条大通道,更是一条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经济大动脉,目前走廊沿途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而且由于南(宁)友(谊关)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和友谊关口岸新联检大楼正式投入使用,友谊关口岸逐渐成为外国游客特别是东盟各国旅客入境到中国旅游的“黄金通道”。还有不少东盟到中国的留学生经越南通过友谊关口岸进入中国。古小松认为,南新经济走廊涉及的国家多达7个,通道距离达3000多公里,尽管该走廊已有一定基础,但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项目,需要一个过程。加上走廊沿线国家的利益和态度有差异,达成一致共识也有一个过程。因此,建设走廊需要做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工作。

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建文在会上作了《越南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主题发言。刘建文说,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东临大海,隔北部湾与中国海南省隔海相望,西接老挝和柬埔寨,南临泰国湾,北接中国广西和云南,处于中国与东南亚大陆的结合部,地理位置独特,是东盟国家唯一与中国有海陆相连的国家。因此,越南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将发挥积极作用。在谈到越南在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刘建文说,越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GMS合作中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是中南半岛国家进入中国和中国通向中南半岛国家的重要的陆路桥头堡之一。

[责任编辑:清泉]